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性别不平等： 现实窘境、议题反思与应对路径

陆杰华^{1,2} 韦晓丹¹

(1.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2.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性别不平等窘境主要体现在疫情加剧女性的就业困难和脆弱性、无酬照料增长和家庭暴力激增、疫情对女性健康产生差异化影响、新的不平等教育和数字性别鸿沟形成,以及疫情中女性领导者的缺位和女性形象的矮化上。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的思路应聚焦于将女性置于恢复决策和进程的核心,对女性全方位赋权,并以预防机制的建立作为应对风险的长期方案,从政策制定、就业平等、家庭责任、健康维护、教育与技术公平、政治与文化参与等方面着力探索性别平等治理工具。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性别不平等;现实窘境;应对路径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对其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研究”(21VMG040)

[作者简介]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韦晓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2)06-0149-10 [收稿日期]2022-02-11

一、引言

2020年初,全面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范围内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在给人健康带来极大威胁的同时亦对经济增长、政治选举、社会政策、文化观念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剧烈冲击和长期持续性影响。然而,无论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期酝酿、中期爆发、缓疫阶段乃至后疫情时期,危机的分布并不均匀,不同社会群体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到的影响存在巨大差别,其中女性群体在疫情中往往因其处于“不可见”的地位而受到更大冲击。

综观全球,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经济活动骤停,社会发展延宕,卫生健康环境受到威胁,国民生计出现资源短缺,女性相比男性在就业权利、医疗护理、社会保障、教育机会等方面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危机^①;另一方面,区域隔离、居家指令等造成个体与社群和资源相隔离的生存状态,女性在承担更多家庭照护职责的同时还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家庭暴力伤害风险。^②有学者为这样的境况提供了一个极为形象的比喻:“尽管世界在同一场风暴中航行,但人们乘坐着截然不同的船只:一些人在超级游艇上航行,而另一些人则紧紧抓住漂浮的碎片。”^③

①徐玖玖《公共卫生事件的性别反思和制度优化——基于新冠疫情性别生态的观察》,《当代青年研究》2020年第6期。

②UN Women, Policy Brief: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Women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policy_brief_on_covid_impact_on_women_9_apr_2020_updated.pdf.

③Guterres A, Tackling Inequality: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a New Era, <https://www.un.org/en/coronavirus/tackling-inequality-new-social-contract-new-era>.

总体上看,新冠肺炎疫情既放大了女性发展的旧薄弱环节,也催生了女性发展的新社会风险。现代社会中,女性作为物质生产者和社会再生产者的独特角色,同时肩负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等多重角色压力,成为这一群体最鲜明的时代特征。^① 女性群体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面临的诸多窘境,主要来自于女性社会角色转变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分配不协调所产生的女性发展问题,与传统性别规范和分工实践不协调所产生的女性分工问题,以及与女性生理和社会特点相关的社会保障政策制度不完善所产生的女性保护问题。上述问题从本质上折射出在现代社会风险下全球性别平等与经济社会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面临更深层次考验。本研究旨在从全球层面、多重领域探讨新冠肺炎疫情下性别不平等的现状与窘境,并对疫情加剧性别不平等的内在机制和应对策略进行探讨,以期启发研究者对性别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

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难掩的性别不平等窘境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迅速蔓延,暴露出当前经济社会制度的脆弱性,加深了原有的社会性别不平等,这反过来又扩大和深化了疫情本身的负面影响。疫情冲击下的性别不平等窘境,主要体现在工作与收入领域、家庭领域、健康领域、教育与技术领域、政治与文化领域。

(一) 工作与收入领域: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女性的就业困难和经济脆弱性

全球范围内的女性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到了更大的工作冲击和经济影响,主要反映在女性就业水平下降幅度远超男性、女性收入显著下滑、性别薪酬差距扩大,以及女性获得的经济保障与社会福利更少上。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世界各地的女性都面临着让她们更容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结构性障碍。

首先,职业性别隔离使女性就业所受疫情冲击更强。受到隔离措施和封锁指令等政策限制,经济活动的停滞对许多行业产生直接冲击,尤其是女性集中就业的第三产业下挫明显,疫情期间的失业更多地集中在女性占劳动力主体的部门。仅在2020年第一次封锁期间,欧盟就有150万女性在高度女性化的行业中失去了工作,如零售业、酒店业、居家护理和家政工作行业。^② 同年间,预计全球范围内女性受疫情影响损失的工作岗位超过5400万。^③ 再者,由于女性比男性更多在非全职和非正规经济中就业,工作的不稳定性更强,也使得女性在疫情下最先面临被解雇或停工的危机。据统计,全球约有7.4亿女性从事几乎没有免遭解雇保障的非正规经济^④,极度缺乏社会保护。与此同时,在非正规经济中就业的女性,其工作部门往往等级较低,在危机中更少地享受相关失业保护计划和收入资助措施。即便能够获得一定资助和补贴,为女性提供的福利也相对较低,或是女性往往由于职业生涯较短或时有中断而难以达到获得福利保障的资格标准,从而被排斥在目标狭窄的社会援助方案之外。^⑤ 在接受联合国调查的45个国家中,其中36个国家中仅有不到1/5的妇女(17%)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获得现金救济,而男性的这一比例达到27%。^⑥ 有大量证据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对女性就业的不利影响远高于男性的情境下,甚至出现了新的合成词语“*She-Cession*”,即把英语中的“她”与“经济衰退”一词结合在一起。^⑦

其次,女性在疫情中受到更为持久的不利社会经济影响。随着各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女性在经济复苏中获益较男性更少,在就业率的恢复上存在巨大性别差异。据统计,2020年夏季的经济复苏使欧洲男性恢复了140万份工作,而女性只有70万份。其中,25—49岁女性的就业增长率极为缓慢,仅为

①朱荟、陆杰华《工作抑或家庭:多重角色视角下性别红利释放的理论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②EIG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Gender Equality) Gender Equality Index 2021-Health, https://eige.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gender_equality_index_2021_health.pdf.

③UN Women, Beyond COVID-19: A Feminist Plan for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Justice, <https://www.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2021/09/feminist-plan-for-sustainability-and-social-justice>.

④UN Women, Policy Brief: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Women.

⑤Rubery J, Tavora I, The Covid-19 Crisis and Gender Equality: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https://www.etui.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1/06-Chapter4-The%20Covid%E2%80%9119%20crisis%20and%20gender%20equality.pdf>.

⑥UN Women, Beyond COVID-19: A Feminist Plan for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Justice.

⑦郭佩《疫情下日本“女性困境”能否缓解》,《世界知识》2021年第9期。

0.3%；而同龄男性的就业增长率是这个数字的2倍多，达到0.7%。^① 美国盖茨基金会在第五份年度《目标守护者报告》中推测，2021年全球范围内的女性工作岗位预计比2019年减少1300万，而男性工作岗位数量基本能够恢复到疫情前水平。^② 新冠肺炎疫情对女性安全和生计持久的不利影响还体现在重回职场后的经济收益上。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选择退出并试图重新进入职场的普通女性，其收入水平较先前平均下降了18%，并且随着退出职场的时间延长，收入水平还将会进一步下降。^③ 疫情对经济和就业环境的影响，使得女性不得不面临更高的就业压力，其就业信心相比男性受到更大打击。^④

再次，疫情极大地增加了女性的贫困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女性收入较低、储蓄较少、工作较不稳定、更多地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获得社会保护的机会较少及在单亲家庭中占大多数等特征，使得她们承受突发性经济冲击的能力普遍不如男性。联合国最新报告数据显示，仅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就使得4700万妇女和女童的生活陷入极端贫困；2021年，在25—34岁极端贫困人口中，男女比例达到100:118；预计到2030年，这一差距将扩大到100:121。^⑤ 不仅宏观层面上性别贫困差距进一步扩大，微观层面上特殊女性群体，包括有低龄子女的母亲、单身母亲、老年女性，以及在疫情前已经生活在贫困中的女性，也更易受到经济衰退的复合影响，从而陷入经济最脆弱的境地。

(二) 家庭领域：家庭角色的困囿、照料的价值剥夺和家庭暴力激增

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相关的多重封锁、行动限制，以及教育机构和其他社会公共服务的关闭，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把大量时间消耗在家庭中，也极大地增加了家庭对护理和家务工作的需求。这些重大变化，深刻影响了女性在时间使用和空间使用方面的机会，不仅导致女性在有偿工作、家庭职责和休闲活动之间时间与精力分配的严重失衡，还引发了日益增加的次生性别暴力，进一步加剧了家庭领域的性别不平等。

首先，无酬照料的迅速增长使女性陷入“时间贫困”状态。随着学校、托儿所和老年照料中心的关闭，女性亲历亲为地承担了绝大部分由国家和社会转嫁至家庭内部的无酬照料工作量，包括照料儿童与老人、安抚家人情绪、督促健康生活等，女性在家庭中的无偿工作成为疫情危机的重要减震器。据估计，在世界45个主要国家中，女性报告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育儿责任和家务劳动增加量比男性高出5个百分点以上。^⑥ 另据欧盟委员会调查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欧盟国家中妇女每周的无酬照料工作量相比疫情前增加了17%。^⑦ 学校和儿童保育服务的关闭不仅增加了儿童照料负担，同时还创造了新的无酬照料形式——家庭教育。在欧盟中，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帮助孩子完成在线教育的主要是孩子的母亲，如葡萄牙疫情期间有77.5%的母亲帮助其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完成学业，而父亲承担责任的比例仅为41.3%。^⑧ 无薪家务劳动增长导致职业女性陷入“时间贫困”，减少了女性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在加剧女性在家庭中角色地位不平等的同时也阻碍着她们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广泛参与。从本质上看，女性如何花费时间是性别平等的一个基本方面，对有偿工作、休息、娱乐及照顾他人等的时间分配会对女性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连锁反应，包括她们的就业选择、健康状况以及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例如，缺乏儿童保育是导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量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⑨。学校教育和托育服务的关闭间接限制了妇女的就业机会，使其不得不在努力争取工资和承担养育职责

① EIG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Gender Equality), Gender Equality Index 2021-Health.

② 盖茨基金会《新冠疫情仍在加剧全球发展的不平等》<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0942221246247747&wfr=spider&for=pc>.

③ 霍莉·科贝特《疫情大流行对女性领导者意味着什么》，《家族企业》2021年第1期。

④ 任艳青、陆元武《疫情背景下大学生就业信心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中国大学生就业》2021年第4期。

⑤ UN Women Policy Brief: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Women.

⑥ UN Women, Women and Girls Left Behind: Glaring Gaps in Pandemic Responses <https://data.unwomen.org/publications/women-and-girls-left-behind-glaring-gaps-pandemic-responses>.

⑦ Eurofound, Education, Healthcare and Housing: How Access Changed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2020,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publications/policy-brief/2021/education-healthcare-and-housing-how-access-changed-for-children-and-families-in-2020>.

⑧ EIGE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Socio-economic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https://eige.europa.eu/publications/gender-equality-and-socio-economic-impact-covid-19-pandemic>.

⑨ Bateman N, Ross M《美研究表明新冠大流行对职业女性伤害最大》，《清研智库系列研究报告》2020年第5期。

中寻求新的平衡。同时,过重的家务负担导致女性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可能性增加,进而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产生性别化差异。根据日本一项调查,有40%的受访者曾在避疫期间考虑离婚,其中82%为女性。^①疫情下女性主导离婚的特征更加凸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女性在疫情中面临的不利地位和更大压力。

其次,由于社会隔离措施收紧,人们普遍被限制在家庭中,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女性面临的家庭暴力激增,对家庭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2020年,全球共有142个国家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封锁措施。^②联合国妇女署就新冠肺炎疫情下隔离政策可能引发的衍生危机发出了警告,强调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正在大门紧闭的家庭中发生,成为“幽灵瘟疫”(Shadow Pandemic)。^③据统计,法国和阿根廷自封锁以来关于家庭暴力的报告数量分别增加了30%、25%;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封锁期间的女性求助电话更是比上一年同期分别增长了73%和48%。^④与此同时,封锁和隔离也使女性不得不与侵犯者生活在一起而没有逃跑的选择,寻求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帮助都变得更加困难,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夫妻之间的暴力行为。^⑤此外,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执法部门、庇护所、心理援助和社区服务等一线机构始终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救助仅能维持低水平的基本服务,无暇应对疫情期间激增的求助信息。^⑥

(三) 健康领域:新冠肺炎疫情对健康产生性别差异化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健康的影响过程和造成的健康后果同样存在着性别不平等。尤其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呈现出传播范围广、防控难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突出特征,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更为持久的危害,因此更有可能加剧不同性别、不同阶层等在防疫职责、防疫资源和防疫能力上存在差异的社会群体间健康水平的分化。^⑦尽管从全球层面来看,整体上男性新冠肺炎感染者数量稍高于女性^⑧,但在广泛的疫情健康危机期间,女性的性别与职业特点、特殊的卫生保健需求、更重的家庭照料职责、更弱的获取社会保障能力等都对其健康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

首先,女性因其在医疗卫生与健康保健部门中极高的比例而面临着更高的感染风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世界护理状况报告》,全球范围内女性在护理队伍中的比例达到70%,而在中国这一比例甚至高达98%。^⑨从医护感染性别比来看,部分国家的一线抗疫医护人员中女性医护人员的感染比例超过男性2倍,在美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医疗人员中约70%的确诊感染发生在女性身上。^⑩与女性医护人员在抗疫中的一线地位极不相称的是,国家与社会对女性医护人员在卫生健康保障方面缺乏足够的必要关切。在医疗防护设备方面,女性医护人员往往因不合适的个人防护设备而比男性医护人员更多地报告职业危害经历。^⑪例如,在中国,根据国标《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技术要求》的规定,中国医用防护服最小号对应身高为165cm,这个尺码相对于中国女性156cm的平均身高而言,对于很多女性医护人员来说都太大了,根本未考虑到那些身材

①王瓚玮《从新社会风险的生成及演变看日本“新冠离婚”》,《日本问题研究》2020年第4期。

②Oxford COVID-19 Government Response Tracker, <https://www.bsg.ox.ac.uk/covidtracker>.

③UN Women, The Shadow Pandem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uring COVID-19, <https://www.unwomen.org/en/news/in-focus/in-focus-gender-equality-in-covid-19-response/violence-against-women-during-covid-19>.

④UN Women, The Shadow Pandem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uring COVID-19, <https://www.unwomen.org/en/news/in-focus/in-focus-gender-equality-in-covid-19-response/violence-against-women-during-covid-19>; Šimonovič D,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Pandemic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with a Focus on Domestic Violence and the “Peace in the Home” Initiative,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Women/SR/SRVAV_CEDAW_FrameworkCooperation.pdf.

⑤Hsu L, Henke A, “The Effect of Social Distancing on Police Reports of Domestic Violence”, *Feminist Economics*, 2021 27(1/2).

⑥徐玖玖《公共卫生事件的性别反思和制度优化——基于新冠疫情性别生态的观察》。

⑦李晓光、吴晓刚《同城异郁:新冠疫情下的性别、阶层与心理健康差异》,《人口与发展》2021年第6期。

⑧Wei X Y, Xiao Y T, Wang J,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Severity and Mortality Among Patients With COVID-19: Evidence from Pooled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sights from Integrated Bioinformatic Analysis <https://doi.org/10.48550/arXiv.2003.13547>.

⑨WHO《2020年世界护理状况报告》,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nursing-report-2020>.

⑩Rozenberg S, Vandromme J, and Charlotte M, “Are We Equal in Adversity? Does Covid-19 Affect Women and Men Differently?” *Maturitas*, 2020 (138).

⑪Regenold N, Vindrola-Padros C, “Gender Matters: A Gender Analysis of Healthcare Workers’ Experiences during the First COVID-19 Pandemic Peak in England”, *Social Sciences*, 2021(2).

娇小的女性长时间连续穿着医用防护服的需求,客观上增加了女性医护的感染风险。^① 在个人卫生用品方面,医护工作者明确性别指向的需求亦远未得到满足。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包括卫生巾、安全裤在内的女性生理卫生用品一直未被纳入疫情保障用品清单,抗疫一线女性医护生理期卫生用品极其匮乏,一些女医护人员甚至只能用保鲜膜暂时覆盖她们的经期出血。^② 直到诸多女性在公众舆论平台公开抗议之后,女性生理卫生用品才被认为是符合疫情期间收集要求的物资,而非满足特殊需求的用品。除了承担社会层面的护理职责外,在以居家隔离为主的防控措施要求下,女性还承担了绝大部分家庭护理和照顾的工作,高暴露性也导致女性在家庭中比男性更容易感染新冠肺炎。来自中国的研究显示,即使考虑了第一代感染者中性别差异对第二代感染者性别差异的影响,女性在家庭聚集性病例中的二代病例比例依旧显著高于男性。^③

其次,除了病毒的直接健康后果外,新冠肺炎疫情还加剧了与心理健康相关的风险因素,女性面临着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由于劳动力市场上性别隔离现象根深蒂固,女性从事不稳定工作的人数更多,以及有酬和无酬工作之间仍然难以明确区分,家庭照料压力更多由女性承担等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压力对女性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一方面,女性在医疗卫生保健和社区服务等与疫情直接相关的部门中所占比例非常高,超负荷的工作强度、高水平的工作压力,以及不断地在工作—家庭—生活平衡中作斗争显著增加了这些行业部门中女性职员的痛苦和抑郁程度。^④ 还有研究表明,由于女性医护人员更多接触受感染患者、更少的社会支持系统和不同的应对机制,其相比男性医护人员在疫情中更容易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⑤ 另一方面,无酬照护和家务工作的增长尤其影响了女性的心理健康,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停滞、社会隔离加强而导致获得基本商品和服务机会受限、社会支持性因素下降的环境下,联合国妇女署调查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报告无酬照护和家务工作增加的女性感受到精神与情绪压力增加的可能性增加了1.6倍,而男性增加了1.4倍,且育儿压力还会额外加剧30岁以下年轻女性的心理抑郁程度。^⑥

再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女性享有性健康与生殖健康服务的权利和质量提出了挑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医疗保健服务获得的障碍,对妇女、女童和其他边缘化群体的性健康与生殖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例如,在欧洲,比利时、德国、拉脱维亚、卢森堡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延长了新冠肺炎监测呈阳性或有相关症状女性的堕胎等待期;匈牙利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公立医院的压力而全面暂停堕胎手术。^⑦ 来自联合国妇女署对45个国家的调查数据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近一半的女性在获得卫生和保健产品(包括月经产品、避孕药具和肥皂等)方面遇到困难,超过1/3(37%)的女性在获得妇科和产科服务方面受到限制,导致孕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加剧,形成至少140万意外怀孕,同时也增加了女性的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感染风险。^⑧

(四) 教育与技术领域: 学校关闭和线上教育形成新的不平等教育与数字性别鸿沟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的国家教育系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疫情冲击下,公共资源与家庭资源的共同约束首先冲击了女性学生享有的教育资源,学校关闭直接导致全球数百万女孩在完成基础学业之前辍学,特别是生活贫困的女孩、残疾女孩及生活在偏远农村地区的女孩,使得她们在积累人力资本方面处于持续劣势。

① 廖敬仪等《新冠病例分析揭示女性的护理角色和高易感性》,《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② Hou Q J, Who Touched My Hair? https://mp.weixin.qq.com/s/BLgHMDwHHowMxMfT_sOQaA; 喻雪红《抗疫医护女性的性别困境及其伦理审视》,《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③ 廖敬仪等《新冠病例分析揭示女性的护理角色和高易感性》。

④ Barelllo S, Palamenghi L, and Graffigna G, "Burnout and Somatic Symptoms among Frontline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t the Peak of the Italian COVID-19 Pandemic", *Psychiatry Research*, 2020(290).

⑤ Calvano C, Engelke L, Di Bella J, et al, "Families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Parental Stress, Parent Mental Health and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 Results of a Representative Survey in Germany",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021(6).

⑥ UN Women, Policy Brief: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Women.

⑦ Moreau C, Shankar M, Glasier A, et al, "Abortion Regulation in Europe in the Era of COVID-19: a Spectrum of Policy Responses", *BMJ Sexual & Reproductive Health*, 2020(4).

⑧ UN Women, Beyond COVID-19: A Feminist Plan for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Justice.

由于传统性别偏好和对养育投资回报率的期待, 贫困家庭往往将教育机会向男孩倾斜, 因此当学校的教育秩序骤然停摆时, 贫困家庭倾向于牺牲女孩的学习机会并使其承担更多的家庭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 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结束后, 全球仍将有 1100 万女童面临无法返校的风险。^① 同时, 新冠肺炎疫情推动教育体系迅速转向数字教育。尽管数字技术使更多学生能够继续学习, 但在线教育策略的普遍使用也进一步加剧了教育资源与教育成就的性别差距。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学生, 尤其是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女性学生, 相比其他同龄人更有可能缺乏先进的数字设备、可靠的互联网接入及安静适宜的学习空间。^② 平均而言, 这些学生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前的学业表现就低于一般水平, 在疫情之后的性别教育不平等还可能进一步扩大。例如, 一项来自中国的研究表明,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在线学习加剧了中学男女生的性别化偏科现象, 尤其是增大了数学成绩的性别差距。^③

在技术层面, 技术进步能够改善女性的社会和经济成果, 然而它也带来了重复和扩大现有性别不平等的风险。尽管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女性数字赋权已取得一定进展, 但在数字技术获得上仍然存在性别差距, 如在中低收入国家, 女性的手机拥有率比男性低 10%, 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女性比男性少 3.31 亿。^④ 显然, 性别数字鸿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女性多维度福祉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影响。在资源匮乏环境下, 女性更可能因无法使用智能手机、计算机或其他网络设备而缺乏获得疫情信息、重要议题讨论、在线医疗、网络购物、在线学习等资源或服务的有效途径。有资料显示, 与男性相比, 女性使用数字技术获取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的可能性较低(37% : 42%)^⑤ 如此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女性在应对疫情时处于不利境地。

(五) 政治与文化领域: 新冠肺炎疫情中女性领导者的缺位和女性形象的矮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女性一直站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 占据全球卫生保健工作者的 70%, 然而她们却被系统地排除在应对疫情影响的决策进程之外。联合国妇女署跟踪调查数据显示, 截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一周, 在 137 个国家的 225 个新冠肺炎决策团队中, 女性平均仅占成员的 24%, 并且其中 26 个工作组中根本无女性成员。^⑥ 决策中如此广泛的性别差距强化了性别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直接影响了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策略导向。女性决策角色的缺位, 直接导致女性的需求更可能被忽视和难以传达, 政策方案性别视角缺失, 进而削弱了对新冠肺炎反应措施的有效性。截至 2021 年 3 月, 应对新冠肺炎 2280 项财政、社会保护和劳动力市场复苏措施中, 只有 13 项涉及针对妇女的小规模和临时性的经济保障, 同时仅有 11% 的措施涉及无酬照护和家务工作。^⑦

在文化领域,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女性形象在媒体报道中受到歪曲和扭曲, 往往被用作引导公众舆论的工具。在大量新冠疫情相关报道中, 对女性工作者的赞扬往往并非基于其出色的专业资格技能, 而是强调其基于性别和家庭角色的“牺牲”。诸如“剪去秀发, 她们整装出征”“流产 10 天后她重回一线”“为上抗疫一线, 7 位妈妈集体断奶”等具有倾向性的报道^⑧, 表面上看, 是给予女性工作关注和道德赞扬, 实际上潜藏着漠视女医护职业身份, 甚至抹杀女医护基本权利的道德暴力和精神强制^⑨。伴随剃光头和理发、戴口罩造成的瘀伤、乳房疼痛的记录, 女性身体作为男性凝视(Gaze)的对象而呈现, 成为男性在公众舆论中构建主流价值观的理

① UN Women, Beyond COVID-19: A Feminist Plan for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Justice.

② Di Pietro G, Biagi F, Costa P, et al, The Likely Impact of COVID-19 on Education: Reflections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Recent International Dataset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2735256_The_likely_impact_of_COVID-19_on_education_Reflections_based_on_the_existing_literature_and_recent_international_datasets.

③ 罗长远、司春晓《在线教育会拉大不同家庭条件学生的差距吗?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准自然实验》,《财经研究》2020 年第 11 期。

④ 梅琳达·盖茨《大流行病给女性带来了什么?》, <https://www.huxiu.com/article/369397.html>.

⑤ UN Women, Beyond COVID-19: A Feminist Plan for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Justice.

⑥ UN Women, Press release: Women's Absence from COVID-19 Task Forces Will Perpetuate Gender Divide, Says UNDP, UN Women <https://www.unwomen.org/en/news/stories/2021/3/press-release-womens-absence-from-covid-19-task-forces-will-perpetuate-gender-divide>.

⑦ UN Women, Press release: Women's Absence from COVID-19 Task Forces Will Perpetuate Gender Divide, Says UNDP, UN Women.

⑧ 杨一丹《疫情报道中的身体政治和健康传播问题——兼谈西方身体理论发展对新闻伦理的影响》,《北京论坛·健康传播分论坛: 医疗、人文、媒介——“健康中国”与健康传播 2020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 年。

⑨ 闫飞飞《关注、凝视和忽视: 抗击新冠疫情中女护士处境的人文反思》,《医学与哲学》2021 年第 9 期。

想场所。通过对女性长相、形体及其作为母亲、妻子、女友等责任的强调,女性在公共领域的主体性被消解,其社会价值被悄悄替代:一个个贡献职业价值的公民被牢牢安置在父权框架的第二性中。^①

三、新冠肺炎疫情下性别不平等的核心议题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危机前所未有地暴露了有偿和无偿工作之间以及经济、政治、家庭和卫生领域之间的重要联系。疫情与阶层分化、家庭分工和生命历程等一系列社会过程紧密交织,劳动力和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最终亦反映在健康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上,展现出一幅宏大而深刻的性别不平等图景。^②因此,很有必要将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性别不平等置入更广阔的研究框架中加以研究和思考。

(一) “不确定”的风险与“确定”的后果:女性赋权的不彻底、不充分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性的性别不平等窘境乃至性别平等倒退,呈现出女性赋权革命和性别平等推进的不完全、不彻底、不充分——女性拥有权力和享受权利是有条件及有限制的,女性运动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并不稳固。在社会运行平稳、资源相对充裕时,女性能够享受到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红利,并主动参与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中;而当社会危机来临、资源骤然紧缩时,女性群体始终首当其冲地受到更大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外生性冲击放大了现代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的关键和薄弱环节。无论是在经济、政治、家庭,还是在教育和健康等领域,在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两性角色之间的利益博弈似乎是不存在的,女性往往被认为是以家庭工作为本职、低产出低价值的劳动资源,从而被迫成为“最先作出牺牲”“权责与报酬最不对等”“最先作出放弃和最先被放弃”的一方;而女性在这种危机面前的结构性脆弱,本质上是现代社会中性别不平等最为隐蔽的一部分。

(二) 从“公领域”的不平等转向“私领域”的不平等:性别不平等窘境的根源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公共领域的不平等与私人领域的不平等彼此相连、密不可分。然而,性别不平等窘境的根源更多来自于“私领域”,即家庭领域的不平等。因此,要打破新冠肺炎疫情下性别不平等的窘境,必须转换理念和视角,从更关注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向重视培育私人领域的平等转变。一方面,在过去几十年间,包括就业、收入、教育等在内的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而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仍旧步履维艰。随着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女性广泛进入经济生产领域,与男性同样接受市场的规则和力量(尽管这些规则与力量往往是性别不平等的),但私领域的照料生产和家务劳动却始终是无偿的。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文化规范对性别平等的阻碍早已远远超出了家庭本身的范围。传统核心家庭的角色分派预设了核心家庭及性别的等级基础,构建出女性“天生”的照顾者形象以及照料和社会再生产的性别规范,然而全面的性别平等绝不可能在一个预设了男女不平等的制度结构中得到真正实现。^③不仅女性本应和能够承载多元化的社会角色,而且照料劳动的价值早已超越纯粹私领域的范畴。家庭角色的困囿和照料的价值剥夺贯串于女性发展的历史并延续至今,性别不平等从根本上镶嵌和运作于“家庭—劳动市场”公私两个领域,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定条件下影响着全球社会中关于职业、收入、劳动组织与家庭责任的安排。多维贫困伴随着暴力和性安全的威胁,女性被迫陷入生产和维系性别不平等的恶性循环。^④

“走出家庭”是“走向社会”的根本基础和必要条件。只要女性的社会角色仍然被固定在传统家庭中,只要承担家务和照料责任仍然是女性无条件的义务,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参与必然总是会受到有形或无形的束缚,如工作领域的职业性别隔离即与女性家庭照顾者的传统规范和刻板印象密不可分。这种束缚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在蒸蒸日上的社会繁荣中被巧妙地隐藏了起来,它始终蛰伏着,随时准备在不确定的现代社会风险来临之时再次将女性迅速从市场上“拉”回至家庭,退回至传统意义上“母亲”“妻子”和“女儿”的角色中。

(三) 性别生态全面的非均衡状态:“失衡”“失语”与“失位”

^①Hou Q J, Who Touched My Hair? https://mp.weixin.qq.com/s/BLgHMDwfHowMxMfT_sOQaA.

^②李晓光、吴晓刚《同城异郁:新冠疫情下的性别、阶层与心理健康差异》。

^③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33页。

^④侯奇江《全球女性贫困:疫情之下的社会并发症》,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0664984199540234&wfr=spider&for=pc>。

女性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她们不仅在抗疫阵线上扮演一线医护工作者的角色,还在社区中扮演防控防疫和健康服务协助者的角色,在家庭中扮演照顾者和护理者的角色,对于改善全球健康安全、维护危机下社会秩序、推动社会经济恢复良好运转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与女性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突出贡献相悖的是性别生态的非均衡状态进一步加剧,性别歧视、性别偏见和性别盲视致使女性不得不在各个领域均面临“失衡”“失语”与“失位”的不利境况。^①一方面,女性获得的报酬与其承担的责任极不对等,大部分与健康相关的劳动报酬过低甚至根本没有报酬,显著“失衡”。尤其是基于家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重要意义愈发凸显,包括隔离封锁、居家办公、公共娱乐场所关闭、学校停课等在内的一系列严格措施实际上将防疫责任和成本分摊至每个家庭中,又通过家庭内部分工具体地落在女性家庭成员身上^②。然而,绝大多数国家对这种责任和成本转嫁并未提供有效的补偿。再如,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社会对护理部门工作人员的认可程度有所提高,但这种认可既没有转化为更高的薪酬和更体面、更安全的工作条件,反而还可能增加了将照料“女性本质化”,进而将其变成对女性经济和道德双重压迫的风险。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中女性自身的特殊需求往往被忽视了。由于女性在国家 and 全球新冠肺炎政策领域的参与度不足,相应地,疫情防范和应对决策缺乏性别视角,相关政策基本是去性别化的,女性在家庭照料、卫生健康等方面的特殊需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处于“失语”和“失位”的尴尬状态。

(四) 制度建设的缺位: 突发危机冲击下性别不平等的“事后处置”与“事先预防”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性别不平等,不仅直接反映出社会在突发危机冲击下应急能力薄弱的问题,从更深层次上,还关涉在社会常态化运行阶段支撑性别平等的体制机制建设缺位、事先预防不足的问题;这不仅是单纯的性别问题、女性问题,更是与基于年龄、阶层/阶级、种族/民族等多维度不平等相互交织的连锁结构而形成的复合问题。因此,既要将对突发危机下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关口前移,加强预防性制度建设,也要将预防性制度建设的着眼点从单一性别维度的视角扩大至多维视角,以更为有效地应对性别与其他特征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性别不平等的具体模式,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使交叉形式的性别压迫合理化和永久化的制度。

四、新冠肺炎疫情下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的应对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各种制度性、结构性的社会瑕疵,从就业、家庭、教育到健康安全,女性发展仍然囿于性别歧视和两性差异,女性群体的脆弱性尽显无疑,亟待改变。基于新冠肺炎疫情下性别不平等的现实窘境以及对窘境根源的反思,本研究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主要的应对思路与具体路径。

(一) 应对思路

1. 从边缘到中心: 将女性置于恢复决策和进程的核心

在以往抗击流行病和其他突发公共危机的过程中,性别问题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附带问题”而处于边缘或隐形状态。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后疫情时代下,我们必须把妇女和女童置于新冠肺炎应对决策与恢复计划的中心,将女性自身特殊需求和妇女权益全面纳入政策考量,更加重视和关心困难妇女群体的利益诉求,确保其合法权益,满足其合理需求,承认其所作出的贡献,以促进性别平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推动建设更加平等、包容和可持续的社会。

2. 从授鱼到增能: 对女性的全方位赋权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社会风险,不能仅仅停留于在危机中为女性提供临时性的物质和服务支持,必须予女性以全方位赋权,着重从经济赋权、社会赋权、政治赋权三方面入手,从根本上提升女性应对风险和抗风险的能力。与此同时,创新赋权举措,改善照料生产和物质消费生产间的性别差异,解决有償和无償护理经济问题,最大限度地减轻贫困的女性化,推动实现两性平等的革命性变革。政治赋权是确保女性诉求得以发

^①徐玖玖《公共卫生事件的性别反思和制度优化——基于新冠疫情性别生态的观察》。

^②张春泥、周洁《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工作、家庭关系及其对负面情绪影响的性别差异》,《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3期。

出的必要保障。只有女性在应对新冠肺炎决策机构中享有公平参与机会,女性意见和诉求才有可能在决策中得到表达与体现,进而对性别平等社会实践产生积极影响。社会赋权是提升女性主体性地位的核心要素。提升女性能动性和社会地位,鼓励女性主动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参与社会资源的平等分配,争取到与健康社会和进步文化相匹配的社会公正与平等待遇。

3.从被动到主动:以预防机制的建立作为应对风险的长期方案

以具有性别视角的综合性制度框架的建立作为降低突发社会风险对性别不平等冲击的核心举措和长期方案。构建普遍促进两性平等的社会保护制度,对于确保在危机面前人人享有最低生活水准,减轻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特有的性别风险和脆弱性,至关重要。实施全面的、预防性的社会保护,也是有效抵御日益频繁和剧烈的经济与环境冲击的关键保障。

(二) 具体路径

1.政策制定:纳入性别视角和完善政策体系,充分收集性别数据为政策提供科学参考

首先,在顶层治理设计中纳入性别视角,基于性别平等理念切实完善女性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平等治理体系,切实完善女性权益保护法律及相关政策,并建立与此相应的监督和评估机制,为女性经济社会参与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其次,特别重视加强分性别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基于性别细分数据推动容纳性别视角的政策研究。再次,将性别作为数据收集的重要分类指标纳入各部门统计业务,着重在女性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巨大的领域,如经济机会、卫生健康和教育等领域收集标准化、可比较的性别数据,增强非传统性别数据的使用。通过解决性别不平等数据和证据方面的差距,增强宏观决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前瞻性,同时确保随着时间推移能够监测性别平等进展情况,为政策调整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2.就业平等:加强利益保护和经济扶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

首先,重视对以女性为主的行业的扶持,保护女性的工作权和工作中的相关权利。推进“同工同价值同酬”真正实现,提升女性社会经济地位,为女性创造安全、健康、没有暴力的工作场所和激励性的工作环境。特别重视为有偿护理部门的劳动者提供资源和监管,以确保持续的服务供应、可靠的服务质量以及体面的薪酬和工作条件。其次,建立更具普惠性和更具包容性的劳动保障与社会保障制度。将社会保护扩大到非正规劳动者,特别是集中在劳动力市场等级结构底层的妇女,如家政服务工人、清洁工人、街头商贩,以及从事其他零工经济的劳动者,将非正规劳动者和流动工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疫情期间失业女性提供必要的经济扶持,降低因失业而带来的冲击。此外,重点保障和有序恢复教育、家政、托育、老年照护等与家庭生活及需求密切相关的行业。尤其是家政和托育等服务行业是通过市场经济实现家庭责任社会分担的重要方式,对减轻女性过重的家庭照料负担、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具有重要意义,不应一刀切式地停工停办。^①

3.家庭责任:推进责任松绑和社会分担,重新界定照料工作的社会价值

首先,从根本上打破女性作为家庭照顾者的固化角色状态。打破传统性别角色定式桎梏,引导男性与女性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平等、合理分配家务劳动、教育子女、照料老人等工作。全社会认同和承认家庭工作的劳动价值,重新认识和界定照料工作的社会价值,大力宣扬照料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和提升人的能力与强化社会凝聚力的贡献。其次,国家和社会要主动为女性分担家庭责任。比如,推行旨在为家庭松绑的公共政策,大力支持家庭和社区的无酬照护工作,通过提供覆盖面更广和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对在疫情隔离期间承担家庭照料责任的家庭成员给予一定补贴或税收减免,以及探索特殊时期的照护假等方式来减轻家庭压力、转移家庭职能。再次,制定封锁和隔离期间的女性家庭安全保护方案。面对防疫限制指令下可能带来的家庭暴力升级和救济困境,有针对性地制定特殊时期预防家庭暴力侵害和救济受害者安全保护方案,确保为受害者提供及时、必要的基本服务,维持受害者获得救助的司法渠道畅通。

4.健康维护:注重充分保护和需求分待,保障疫情下女性特殊健康需求

在健康领域,应充分考虑影响女性和男性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暴露的不同脆弱性及其背后隐含的性别规

^①徐玖玖《公共卫生事件的性别反思和制度优化——基于新冠疫情性别生态的观察》。

范、角色和关系,深入识别新冠肺炎疫情在健康方面直接和间接的性别化影响,并纳入相关应对举措中。一是完善对女性医护人员的保障,确保医疗防护用品和卫生设施的充足供给。在医疗防护设备的生产研发中充分考虑女性生理特点,为女性医护提供适配性更强的个人防护设备。将女性生理卫生和保健用品纳入常规性疫情保障用品清单中,以确保调配。二是针对家庭护理者出具更具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疫情防护手册,提升女性在护理新冠患者或照料风险个体时自我保护的能力,降低二次传染风险。三是注重保护一线防疫抗疫人员的心理健康,定期为其提供情绪安抚和心理疏导。四是保障女性基本医疗卫生健康服务,确保常规性保健和生殖保健的服务供给。为孕产妇开辟绿色通道,实施分类管理,保障其在疫情期间享有及时、安全就医的基本权利。

5.教育与技术:强化服务支持和资源保障,消除性别数字鸿沟

确保女性学生和其他弱势学生在教育机构临时关闭期间的学习连续性,保障其平等接受在线教育的机会,缩小教育资源的性别不平等。一是在在线教育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公平因素,针对缺乏高速宽带和数字设备且又无法快速实现短期覆盖的地区,教育系统需要考虑其替代模式以确保所有学生都能获得服务。二是为弱势背景学生免费分发数字设备和相关学习资源,给予适当经济补助,同时保持更为紧密的家校联系和学业跟进,使其在疫情特殊时期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平等受教育权利和需求能够得到及时满足。帮助女性掌握新技术技能,融入新技术环境,充分享有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避免性别数字鸿沟可能带来的新的经济社会不平等问

6.政治与文化:扩大女性参与和女性声音,展现女性力量与社会贡献

提升女性在决策机构的比例,支持女性积极参与和领导疫情应对的决策制定过程,增强女性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中的声音,让女性在影响其生活的所有决策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鼓励妇女权利组织广泛开展工作,并作为性别平等倡导者、政府工作监督者和社会服务提供者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促进媒体描绘和宣传多元、平衡而非陈规定型的女性形象,呈现她们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不同的生活和对社会的贡献。鼓励女性使用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在公众舆论和社会文化领域对抗性别不平等、参与传播民主进程。

**Gender Inequality under the Impact of COVID-19:
Realistic Dilemma , Issue Reflection and Coping Path**

LU Jie-hua^{1,2}, WEI Xiao-dan¹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 China;

2. Center for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of China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 China)

Abstract: The COVID-19 outbreak has set back the status of women’s development and gender equality globally. The dilemma of gender inequality under the impact of COVID-19 outbreak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exacerbation of women’s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 the increase in unpaid care and the surge in domestic violence. It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women’s health , occurrence of new unequal educ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digital gender divide , as well as the absence of female leaders and the dwarfing of female images in the epidemic. The idea of further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shall focus on placing women at the core of recovery decision-making and processes , empowering women in all aspects , and ta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eventive mechanisms as a long-term plan to deal with risks. The means of gender equality governance shall be explored from policy formulation , employment equality , family responsibility , health maintenance , education and technological equity ,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COVID-19; Gender inequality; Realistic dilemma; Coping path

[责任编辑:冯金忠]